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文史通义全译

[清]章学诚　原著　严杰　武秀成　译注

上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赵　泓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赵玄渊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文史通义全译
[清]章学诚　原著　严杰　武秀成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0.625印张　1060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221-03938-0/K·337(平)　(全二册)定价：42.80元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文史通义全译

[清]章学诚 原著 严杰 武秀成 译注

下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1 年～1995 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本丛书荣膺中宣部 1993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大奖

中国历代名著全

1. 周易全译
2. 今古文尚书全译
3. 诗经全译
4. 左传全译
5. 四书全译
6. 资治通鉴全译
7. 国语全译
8. 战国策全译
9. 贞观政要全译
10. 晏子春秋全译
11. 吴越春秋全译
12. 越绝书全译
13. 唐才子传全译
14. 水经注全译
15. 大唐西域记全译
16. 徐霞客游记全译
17. 史通全译
18. 文史通义全译
19. 荀子全译
20. 新序全译，说苑全译
21. 孙子全译
22. 论衡全译
23. 尉缭子全译
24. 管子全译
25. 商君书全译
26. 韩非子全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译丛书书目（50种）

27. 墨子全译
28. 管子全译
29. 吕氏春秋全译
30. 韩非子全译
31. 抱朴子全译
32. 颜氏家训全译
33. 梦溪笔谈全译
34. 西京杂记全译
35. 世说新语全译
36. 山海经全译
37. 搜神记全译
38. 博物志全译
39. 老子全译
40. 列子全译
41. 庄子全译
42. 楚辞全译
43. 陶渊明集全译
44. 文选全译
45.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46. 唐诗三百首全译
47. 宋词三百首全译
48. 文心雕龙全译
49. 诗品全译
50. 花间集全译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前　言

《文史通义》是清乾隆、嘉庆时期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综论文史，见识卓越，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相媲美。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六十四。其父章镳，字骧衔，乾隆七年中进士，此后在家乡教书多年，直到乾隆十六年才出任湖北应城知县。在任内以疑狱失轻免官，贫困不能归乡，侨居应城，曾主讲应城、天门两县的书院。乾隆三十三年卒。

章学诚十四岁时，随父往应城。他少时多病，读书也迟钝，但对史学很有兴趣，并逐渐形成独到的见解。乾隆二十五年，他离家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未中。乾隆二十七年，又应顺天乡试，仍未中。当年冬天，他入国子监读书，因不专力“举业”，考试成绩常列最末几名，被人轻视。

乾隆二十八年夏天，他请假回湖北省亲，当时其父正主讲天门县书院。次年，其父主修天门县志，他代父作《修志十议》及县志中若干篇序文，在此之前，又有《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的方志学基本观点已经提出。

乾隆三十年，章学诚回到北京，仍在国子监学习。这年又应顺天乡试，同考官沈业富推荐他的文章，但未被录取。于是沈业富请他到家中教书。不久，他从翰林院编修朱筠学古文，深得朱筠赏识。乾隆三十三年，他应顺天乡试，仅中副榜。这年冬天，其

父卒于应城。从此他担起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家境贫困，但研究学问的志向不改。

乾隆三十六年冬，朱筠出任安徽学政，章学诚随同前往，同行者中有邵晋涵，从此两人成为史学知己。也就在这时，章学诚有了撰写《文史通义》的计划，并开始着手进行。乾隆三十八年，他应和州知州之聘，编《和州志》，次年成书。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修志，从中运用了他自己的方志理论。乾隆四十年，章学诚还京，常与当代学者交游。次年，援例授国子监典籍。乾隆四十二年，他应友人周震荣之聘，主修《永清县志》。这年秋天，入京应顺天乡试，成举人。次年中进士，时已四十一岁。他自以为不合时俗，不愿作官，仍返永清，继续修县志，于乾隆四十四年修成。这年，他的重要著作《校雠通义》完成，共四卷。《校雠通义》代表着清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其中有许多重要见解与《文史通义》相发明。两年后在旅途中遇盗，平生撰著手稿尽失，《校雠通义》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第四卷竟不可复得。

乾隆四十六年，朱筠卒，章学诚失去依靠，此后生活极不安定，到处奔波，先后主讲肥乡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以此维持全家生计。但他仍能撰著不辍。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学诚往开封见河南巡抚毕沅，很受器重。次年，往河南归德府主讲文正书院。经毕沅同意，于开封开局编纂《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不久，毕沅调任湖广总督，他只得移家安徽亳州。乾隆五十四年春夏，游太平，在安徽学使署中教书。讲课之余，完成《文史通义》中《原道》等重要文章多篇。这年冬到次年春，为亳州知州修《亳州志》。乾隆五十五年春，章学诚往武昌依毕沅，直到乾隆五十九年秋毕沅降山东巡抚后，他离开湖北回乡。在武昌五年，他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为毕沅主修《湖北通志》，并参与毕沅主编的《续资治通鉴》的编撰，此外还编修了《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是章学诚的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志代表作，但毕沅离开后被废弃不用。

乾隆五十九年，章学诚回乡后，曾出游江苏、安徽。为了完成宏大的《史籍考》，他多方请托，终于得以借浙江巡抚谢启昆之力，于嘉庆元年在杭州继续纂修，成三百二十五卷，稿竟不传。嘉庆五年，他眼睛失明，仍口授著作。嘉庆六年十一月，章学诚病卒。

自乾隆三十六、七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文史通义》。但由于生活不安定，未能集中精力写作，直到他逝世尚未完成。在他去世前几年的嘉庆元年，他曾编过一个选刻本，但不欲广为流传，他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至于全书的篇目，他未及最后确定。临终前不久，他将全部文稿托付友人王宗炎校定。王宗炎拟分为内、外篇，内篇包括《文史通义》、方志略例、《校雠通义》、《史籍考》叙录，外篇录铭志叙记之文，附以《湖北通志》传稿。对于这样的编排，章学诚本人的意见已不得而知。王宗炎不久也去世，章学诚的著作未及刊刻。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才由次子章华绂在开封刻印《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雠通义》三卷。章华绂在序中说：王宗炎所编订的目录，"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这个本子称作大梁本。清末的多种刻本都出自大梁本。1922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依据王宗炎所定目录与稿本，改编增补，刊印《章氏遗书》五十卷，使章学诚的著作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于世。《章氏遗书》包括《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于是《文史通义》有了另一种版本。

目前流行的《文史通义》版本，主要是大梁本与《章氏遗书》本两个系统。两种版本的内篇稍有差异，外篇则全然不同。内

篇的不同之处是，大梁本分五卷，《章氏遗书》本分六卷，篇目次序不尽相同，《章氏遗书》本多出《礼教》等八篇，而少《妇学篇书后》一篇。外篇虽然都是三卷，但大梁本是论述方志的文章，《章氏遗书》本是驳议序跋书说。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版本的外篇的内容，章学诚自己都看作是《文史通义》的内容。例如，他曾说《亳州志》“义例之精”，是“《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三《又与永清论文》），也曾说“《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三《与邵二云论文书》）。因此，两种版本都不能说完全符合章氏的原意。比较而言，方志学理论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方志论文排除在外是很不妥当的。因此，可以说大梁本稍胜于《章氏遗书》本。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这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思想受到禁锢的时代。章学诚不满当时脱离社会实际的学术风气，意欲持世救偏，这就是《文史通义》的主要写作目的。他说过：“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上辛楣宫詹书》）当时人常把文化思想界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途，他概括各家之弊：“骛于博者（指考据家），终身弊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他从而指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原学下》）又说：“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天喻》）由于与当时风气不合，章学诚一生落落寡合，学说未能广泛流传。但自从清末起，他的影响越来越大。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最著名的论点，也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在章学诚之前，学者已有类似的说法，但他赋予这一命题以新意，使之系统化，因此可以说“六经皆史”说是他的创见。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又说：“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经解上》）这就是说，六经不是空言，而是先王的政典，是治理天下、切合社会生活的实迹。因此六经是史。后人视六经为载道之书，但六经之“道”并不脱离社会实事这“器”，因此六经的重要意义在于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六经皆史”说的目的。

经世致用，是清初浙东学派的主张。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开山祖师，擅长史学，治史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联系社会实际。自黄宗羲到万斯同，再到全祖望，一脉相承。章学诚作《浙东学术》篇，隐约自列于浙东学派。他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为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继承了浙东学派的传统，提倡经世致用，所以他对汉学家“舍今而求古”的烦琐考据和宋学家的“舍人事而言性天”的空谈都加以有力的抨击。

与“六经皆史”说相关连的有“言公”说。“言公”的主旨是：“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言公上》）“言公”说的依据是古代治教合一，官师不分，事理无殊，道器不离。章学诚说：“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求

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原道中》）又说：“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史释》）六经皆史，学术在官，二者实则浑然一体。

《文史通义》的重大贡献是在史学理论上，主要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强调史学家具有“史意”、“史德”的重要性，辨明史料排比和史著的区别，主张扩大史料范围和改革史书体裁。

强调“史意”、“史德”，是章学诚的创见。刘知幾曾指出史学家要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人们将章学诚比拟刘知幾，他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他又曾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和州志志隅·自序》）章学诚认为刘知幾不知“史意”，知“史意”才可以成一家著述。“史意”，章学诚又常称“史义”。什么是“史意”呢？“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那么“史意”与刘知幾所说的“史识”又有什么区别呢？大体上说来，“史识”是就历史编纂方法而言，指对史实的判断能力，所以章学诚说“刘言史法”。“史意”是指史学家的历史观、作史主旨，与史事、文辞相关，起指导作用。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言公上》）《孟子·离娄下》记载孔子说，《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章学诚提出“史意”，实际是从这里得到启发。他看这

样的阐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答客问上》）可见他提倡"史意"，是希望史学家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提出"史德"，也是对刘知幾史学"三长"的补充，他专门写了《史德》篇加以论述。他说："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刘知幾曾说过：三长之外，"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旧唐书·刘子玄传》）。这涉及著史者的品德。但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或"心术"，指"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天"，指客观事实；"人"，指著书者的主观意图。他的要求是，史学家应当慎重辨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尊重客观事实，而不加进主观成分。他提出"史德"，是因为看出历来提倡的"直笔"还不能完全解决如实反映史实的问题。他认为，人有情感，看待史事会有情感变化，以至于"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因此他指出要注重平日学养，节制个人的"气"与"情"，使"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尽量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章学诚极清晰地辨明了史料排比和史学著述的区别。传统的史学分类法只从体裁上着眼，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等，章学诚则从性质上着眼，划分为两大类，即记注和撰述，或称比类和著述。记注或比类，指史料排比；撰述或著述，指熔铸史料而成的著作。关于这种区别，刘知幾曾有初步的认识："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

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史通·史官建置》）南宋郑樵也有类似认识。但只是到了章学诚才彻底弄清这区别。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何在呢？他说：“《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书教下》）这是说记注遵守一定体例，完备无遗；撰述融会贯通，不必谨守绳墨。他还作出形象的比喻：“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针对当时以考订为学的风气，他更重视撰述。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经世致用的目的之外，还有另一意义，即扩大史料范围。他更进一步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在拟订《史籍考》采集书目范围时，他提出“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综观他的论著，他所说的史料包括儒家经典、私家著作、州县志书、官府案牍，金石图谱、民间谣谚等。

章学诚提出了对史书体裁进行改革的意见。南宋袁枢依据《资治通鉴》，作《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章学诚很推崇纪事本末体。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书教下》）他主张就纪传体加以改革，采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使其趋于完备。新的体裁应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